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古籍与文献的内涵

什么是古籍，古，故也。籍，书也。古籍即古书。收集整理古籍，亦即收集整理古书。古，是个时间概念，不同时期，对古籍的“古”的时限界定也不同。“文革”前，界定古籍的时间下限为明末。而“文革”后学术界对古籍的时间下限却有了三种主张。一是按史学界对中国通史阶段划分法，以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为限，即：1840 年以前的书均为古籍。二是主张以 1919 年“五四”运动为界，因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化的开始，此前可视为旧文化，自然此前的书统属古籍。三是主张以 1911 年辛亥革命为限。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旧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亦即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目前学术界基本上采用了这个时间下限。以 1911 年为界，能比较完整地体现出古籍的内涵，即从奴隶社会到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文化遗产。

讲古籍往往与文献联系在一起。古籍是指古书，而文献的涵意较古籍更广泛。文，系指文字资料，献，系指贤人的言论。“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音义),古代乐舞的行列,一行八人为一佾。奴隶制社会用舞蹈人数的多少表示奴隶主贵族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间的等级差别。所谓‘天子八佾”,即天子的舞队共有六十四人〕。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这里的‘文献”,系指历朝的文件和当时贤者之言。后来，“文献”一词的概念有了变化，一般单指历史文件而言。而发展到今天，“文献”一词涵意更广，一般泛指所有记录知识的印刷型与非印刷型的出版物和其它特种文献。现在我们所说的古籍文献，系指清末以前的雕版、活字版和手抄的古籍文献，其中包括文书、卷册、 碑铭、拓本等。

中国的古籍文献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卷帙之浩繁，内容之丰富多彩，在人类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内涵包容极其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法学、农学、医学、科技、外事、方志、民俗、谱牒及宗教经典等等，可以说包罗万象。

第二节　汉文古籍文献

中国的古籍文献，就现行的形式可分为汉文古籍文献和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本书虽然是讲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但同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述及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之前，首先介绍一下汉文古籍文献也是十分必要的。目前生活在中华民族这块国土之上，各民族的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共同发展的。只不过因为历史的原因，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不一，文化发展亦不平衡而已。但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五十六个民族对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都尽了自己的责任，做出了贡献。但也

必须看到，在五十六个民族中汉族文化是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在古籍文献的收集整理领域，汉文古籍文献更在前茅。所以，了解汉文古籍文献的历史与现状，对了解以及收集整理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汉文古籍文献的形成，按一般通用说法，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以前殷代的“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是当时史官保管的重要文献。之所以称“甲骨文”，是因殷代的奴隶主为了占卜吉凶祸福而将文字刻在龟甲和牛、羊、鹿、猪的肩胛骨上，故曰“甲骨文”;“金文”又称“钟鼎文”,即当时人们在青铜器物上刻铸的字，亦称“铭”，后人称为金文。甲骨文与金文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甲骨文时代虽早，但被发现却相当晚，1897年开始发现，至今仅90余年。目前国内有40个城市、90多个单位收藏甲骨达十万余片。

金文迄今发现有七千多器。

甲骨文和金文都是零散的，是文献，而不能称其为书（籍）。我国最早的书籍是简策和版牍。简策是将竹子断成筒而后劈成片，经过“杀青”后用来书写。单片称为简，将简编连一起称为策（册），通常一策（册）即为一篇完整的文章。今天我们称书的量词为册，就是由此而来。在编连策时，一般用麻绳、丝绳和牛皮绳。用麻绳和丝绳的称“丝编”,用牛皮绳编连成策的称“韦编”。编有二、三、四、五编之别，即指在编简时是用几道绳子编连而

简的长度不一,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之分。秦

汉时期，习惯用最长的简写经典著作；用一尺二寸的写“孝经”，而短的因携带方便，于是用于记事或其它。

版牍是将树木制成版，以便于书文与绘图。木版的面积即长与宽的比例，常见的是三比一，也有成正方形的。因木版非正方即长方，故又称“方”。最长的木版长约三尺，称为“椠”，二尺长的称‘檄’,一尺长的称‘牍’,五寸长的称‘传’。由于木版的面积不同，所以能容写的字数亦不同，有的可写几行甚至十多行，有的只能写一行，实际上成了木简。木版一般用以写公文、通信或绘图等。除木简外一般不用作写专著。《仪礼·聘礼》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名”即指字，这就是说百字以上的文章用牍策，百字以下的文章用方牍。一般通信常用一尺长的“牍”，所以后来书信才有“尺牍”之名。书写公文与书信的版，往往再用一块同样的木版作盖用，作盖的木版称为“检”。书写好的木版加上检后捆起来又称作“函”。现在使用的“公函”、“信函”之称就来源于此。在检的版面上写收函与寄函人的姓名，称“署”。木版的面积比竹简宽大得多，因此又常被用于绘图，故而迄今称表示国土的地图为“版图”。

简策与版牍较之甲骨无疑是大大进了一步，但仍是笨重，不仅翻阅不便，携带更为麻烦。西汉文学家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了一篇奏章，共用了三千根竹简，要由两个壮实的人才能抬进宫去，可见使用之不便了。

春秋战国时期，在使用简策与版牍的同时，又出现了“帛书”与“缣书”。即把字写在丝织品上，携带与保存都比简策与版牍方便，但价格昂贵，因此“帛书”、“缣书”不能象简、牍一样

普遍使用。1974 年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有“老子”、“周易”、“战国策”、“左传”、“天文占星”、“医经”、“相马经”等二十多种，总字数达十二万字。

无论是简策、版牍，还是帛书、缣书，都是产生在世界上还没有发明纸的时候。我国是世界上发明造纸的国家。发明造纸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没有纸的发明，人类文化的传播就要受到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都要受到影响。因此，纸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科学发展及人类的社会进步作出的一项十分重大的贡献。

按一般的说法，纸是东汉宦官蔡伦于公元 105 年发明的，但近半个世纪在新疆、陕西、甘肃先后四次出土了西汉时期的古纸，这就是说纸的发明不是在东汉，而是在西汉就有了。据说古文献中也有此记载。

在我国未发明纸之前，世界上其它国家人民也都曾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书写材料，罗马人用过蜡板，埃及人用过纸草，西亚人用过泥板，小亚细亚人用过羊皮，印度人用过树枝和棕榈叶。

我国发明的造纸法首先传入朝鲜(魏晋时期)。而后,公元 610 年又从朝鲜传入日本。公元 751 年(唐玄宗天宝十年),向西传到阿拉伯。公元 1150 年，又从阿拉伯传到欧洲。十六世纪后，又由欧洲传到北美洲。之后，逐渐传遍了全世界。

我国发明造纸后，在西汉末东汉初，开始有纸书。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简牍帛书的地位。纸书的最初形成沿袭帛书，先把几张纸粘连起来，成为一横幅，然后两边各用一细木棍做轴，以便于卷起。纸上画成直格，书写后由尾向前卷成一束，叫一卷。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部书有许多卷，为避免散乱和便于保护，外面用麻布或丝织品包装起来，这就是帙。卷帙浩繁的“卷帙”也就来源于此。

1924 年和 1965 年，在新疆地区先后发现了两份晋人抄写的纸本《三国志》残卷。目前为止，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纸卷书。这种卷轴式的书，从汉代一直沿用到北宋初年，直到雕板印刷术发明后，才逐渐演变成册页形式的书。册页形式的书是经过纸书卷轴装、纸书旋风装、纸书经折装、纸书梵夹装等形式后发展到最初的蝴蝶装（始于五代盛于宋代）。之后逐渐发展到包背装，（流行元、明两代）。大约在明朝中叶，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又产生了线装。这种线装装帧一直延用到清末。民国以后，乃至今天，有的为了保持原书原貌（如影印出版的古籍），或因某种特殊需要，仍在用这种装帧形式。在今天看来，线装的形式，几乎是古籍的一种标志了。

书的装帧形式的发展是与书的制成密切相关的。从汉文古籍文献的形式上概括，汉文古籍文献有甲骨、钟鼎文，写本（这里专指策牍、帛书、缣书和二至十世纪——特别是隋唐两代手写的纸本）、刻本、活字本和抄本。

刻本也叫刊本，就是雕版。据有关资料记载，雕版始于唐初，（公元七、八世纪）。到了唐代，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对书籍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这就势必要求印刷术有相应的发展。雕版印刷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是在印章和碑拓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雕版的出现，书籍印的又多又快，自然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与传播。雕版是由一整块木板雕刻成一块版面。唐末宋初，雕版印刷已相当发展和普遍。北宋开宝四年（公元 971

年），宋太祖派人到成都主持雕刻《大藏经》。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 983 年），雕版十三万块，五千余卷，这就是著名的《开宝藏》（亦称蜀版藏经）。随后又有福版、浙江思溪版、碛砂版的《大藏经》。由此可见宋代雕版印刷术发展之一斑。

宋代分北宋（公元 960—1126 年）和南宋（公元 1127—1279 年）两个时期。北宋刻书中心主要是在京城汴梁（今开封）、临安（今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及眉山。由于金兵进占中原，北宋刻本大都佚失。存下的极少，已成为极其珍贵的版本。南宋时期雕版业几乎遍布江南各地。但著名的刻本是以浙江省、福建的建宁府和建阳县及四川省的刻印本为代表。浙江省的称浙本，福建的建宁、建阳本称建本，四川的称蜀本。

宋刻本的字体有欧体（欧阳询）、柳体（柳公权）（这两体属瘦体）和颜体（颜鲁公属肥体）。浙本多欧体，建本多柳体，蜀本多颜体。宋刻本的中缝下端有刻主的姓名（有的只刻姓，有的则只刻名）。现存的宋刻本中缝处下端若没有刻主的姓名，多因当时是蝴蝶装，中缝内粘破损或因虫蛀的缘故。宋刻本中除官刻本外，私刻本、坊刻本还多刻有牌记（牌记内一般刻有刻主的堂名、人名，有的还刻有刻书的年月）。

南宋刻本中，坊刻本为追求利润，刻印快速，开始采用简体字。

南宋是与金并存的，北为金南为宋。北宋时期的刻书中心，在金时，由汴梁转移到山西平阳（又称平水，今临汾）。平阳书坊极为发达，多刻有医书、类书和说唱调等。皇统八年（公元 1148 年）开始雕刻，大定十三年（公元 1173 年）完工的《大藏经》

(金版大藏经,又称“金藏”“赵城藏”),共收佛经六千九百余卷(1933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此版藏经四千九百五十七卷),刻印水平很高。但金代刻本流传至今的甚少,而“金藏”又是最典型的金刻本。因此,“金刻大藏经”(赵城藏),是极其珍贵的,现已成国宝。

北宋时,除木板雕刻外,还出现了铜板雕刻。雕版印书自然要比手写快得多,但从印刷角度讲,还是有许多不便之处。很明显,一部书要刻很长时间、很多版,而且还要许多房屋装存这些雕版。在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主要是泥活字)。这无疑对印刷术的发展起了更大的推动作用。

到了元代,又首创了套版印刷技术和出现了木活字印刷术。元代雕版有两大特点,一是字体多用赵体(赵孟頫),二是使用简体字普遍,这方面远远超过宋代。

到明代印刷技术又有了巨大的发展,在雕版中创造了新的技术——饾版及拱花。并首创铜活字。南京和北京先后成为明代的两大刻书中心。

明代的印刷技术在我国雕版印刷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明刻本的字体初期仍袭欧、柳、颜、赵四体,中期字体结构渐趋方正,而明代末期,字体变长形,形成长宋体。明刻本的主要缺点是遗漏、错讹较多,有的乱改书名,甚至随意删节书籍内容,有的还伪造古籍,致使学术界普遍重宋本和元本,参考明本。

到了清代,各种印刷技术更有长足发展,官办书局纷纷设立。先后大小有十八个官办书局,它们是金陵官书局(后改江南官书局)、江苏官书局、江楚官书局、淮南官书局、苏州官书局、敷文

官书局、浙江官书局、江西官书局、湖北官书局（又名崇文书局）、山东官书局（又名皇华书局）、湖南官书局（光绪年间更名思贤书局）、福州官书局、广雅书局、四川官书局（原名存古书局、又名成都书局）、云南官书局、贵州官书局、直隶官书局、濬文书局等。这些官办书局以刻印御批钦定的经史书居多，诗文其次。

清代康熙年间（公元 1662—1722 年）和乾隆年间（公元 1736—1795 年）是刻书业最为兴盛时期。特别是随考据、辑佚、校勘的兴起，刻书业尤为发展。

清初时刻本字体仿明本，并变为扁方字体。康熙年间形成一种非颜、非柳、非赵的馆阁体，系属一种手写体的楷书字。康、乾、嘉三朝尤兴由著名书法家手写、精工雕刻之风，留下了佳刻精本。道光（公元 1821—1850 年）以后，清廷日趋衰落，版刻也日渐低劣，多变为结构呆板的匠体。清刻本有一种整齐方正保留有楷书风格的仿宋体。自清代，习惯称方体为宋体，称楷书为软体。

清刻本的书，书前有封面，封面上有书签。封面后还有书名叶（即内封面）。书名叶正面一般分三个部分，即中间为书名、上行（或叫右行）为编著者，下行（或称左行）为雕版或藏版者。书名叶背面往往刻有牌记，记印刻地点及年月。

雕版印刷汉族延用了一千多年。目前在北京，有的单位仍保存有汉文古籍的雕版，因此在再版这些古籍时，仍用雕版印刷，保持了该书的原貌。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也有雕版，如藏族的经书、医书等至今有的还在用雕版印刷（如四川甘孜州的德格印经院和西藏的一些寺院）。

古籍整理就是对前人的书籍进行加工，或者说是对前人的文

化成果进行加工，为今人和后人所利用整理古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标志着社会的兴衰。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盛世修文的缘故吧。秦始皇焚书坑儒，到了汉武帝时就下令征集全国图书。到汉成帝时（公元前 26 年）再次下令向全国征集图书，并组织人校勘群书。刘向任总校刘向死后，刘歆（音欣）继其父业，综合群书《叙录》而编成“七略”，对群书进行分类。可以说，这是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七略”将当时的书籍文献分成七大类，这是刘向父子奠定了我国的古典文献分类法以后，历代又有新补充订证。大致说来，有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七分法，九分法，十二分法。但不管几分法，基本沿袭着刘向父子的传统，只不过是有所增减而已。到了晋代，晋武帝咸宁年间（公元 275－279 年）另编“新簿”，即“晋中经簿”，内分甲、乙、丙、丁四部，总括群书。当时的甲部为“经书”、乙部为“子书”、丙部为“史书”、丁部为“文集”。到唐代，《隋书·经籍志》的编者魏征等又把这甲、乙、丙、丁四部直接标为经、史、子、集，这就是汉文古籍四部分类法的由来。从晋代一直延用到清代。著名的《四库全书》，也是按经、史、子、集四部编录的。“经”是指封建社会里被推崇为典范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著作。“经部”主要是“十三经”〔《诗》、《书》、《易》、《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及论、注。“史”就是史书。“子”是指历史上的诸子，“子部”，即诸子百家著作之总称。“集”是指文集。“集部”含楚辞、别集、总集。别集是指汇集一个人著作的书。而汇集许多人著作的书称总集。

汉文古籍整理，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几乎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历朝历代都有人从事这项工作。有的朝廷出面组织，有的是个人从事，正因如此，汉文的古籍文献才得以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才能如此宏丰又多彩多姿。也正因为有了这许多古籍,汉文化才能在五十六个民族中领先发展。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连续的。而标志着历史发展的文化，也是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连续发展的，任何一种新的文化都是在旧的文化基础上，经过变革而诞生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如此。据有关资料认定,汉文古籍文献现存 8 万种或 10 万种(两种说法都对，只是统计时计算方法不同而已)。

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对古籍文献是很重视的。他们整理古籍的目的，一是想从前朝的兴衰中寻找出有利于巩固自己政权的经验来，二是标榜自己重视文化，以笼络文化人进而笼络天下入，巩固统一的江山。如清代设立了十八个官办书局，以禁锢人们的思想，笼络文人，稳固统治政权。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在整理古籍的同时，也销毁了大批认为对自己不利的珍贵的古籍文献。清朝编“四库全书”时，在销毁之列的所谓禁书达三千多种，六、七万部。应当指出的是，历史上汉族统治者不管如何标榜自己重视历史文化，但都排除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历史上的整理古籍,都不包括少数民族古籍。也正因如此,才造成今天的汉文古籍文献与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分流的局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三节　民族古籍的内涵

民族古籍，确切的说应是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出于一种习惯，就简称民族古籍。

民族古籍是相对汉文古籍而言的。民族古籍囊括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古籍，因此，民族古籍是个总的称呼。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任何一个民族的古籍，都属民族古籍范畴。

民族古籍的涵义，不完全同于现在称谓的汉文古籍。现在所说的汉文古籍就是指古书而言，不含其它。而民族古籍由于历史原因，古籍的含义是广义的，它不仅是指那些有文字记录的手写的或印刷的出版或非出版物，还包括至今仍流传在民间的口碑文献。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地理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各民族历史进程不同，各民族的文化发展也不平衡。有的民族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也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有的民族虽有悠久的历史，却因无文字记载，它的历史与文化，全靠口碑一代一代往下传。建国前,在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只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古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傣族、彝族、纳西族、僳僳族、拉祜族、景颇族、苗族(黔西地区)、佤族、锡伯族、满族和朝鲜族等十九个民族有文字，加上通用汉文的回族与畲族，总计二十一个少数民族有文字。其它三十四个民族没有文字。没有文字自然没有文字记载的书。如果按汉文“古籍”词义要求，这三十四个民族自然也就没有古籍而将被拒之古籍大门之外。其实古籍从某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

历史文化，甚至是历史文化的重要部分。没有文字，不等于没有历史文化。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继承，主要靠口耳相传，代代承袭。正如侗歌中所云“古人讲，老人谈，一代一代往下传；树有根，水有源，好听的话儿有歌篇；汉家有文好记载,侗家无文靠口传”。不能用汉文古籍的定义来套民族古籍。其实，汉文古籍的早期也是含口碑文献的。无论是“诗经”，还是“山海经”，都是先在民间口头流传，后人根据这些口头流传记录整理成文字材料，最后成书。人类在没有发明文字以前，一切生活活动，都要靠口耳相传。这种口耳相传的材料，在古代就是史料，也就是古人研究历史和记载历史的依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口耳相传的材料也被历史化了，被记入了史册，成了今天的古籍。在汉文古籍中有关史前的记载，也大都这样形成的。因此，我们不能因汉字问世早、口碑文献早已记录成册，便不顾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差异，而将少数民族的口碑文献从民族古籍范畴中排除。不论这样做还是这种主张都是不科学的。倘若主张民族古籍中不应包括口碑文献，而只限于文字记录的书，那就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不符合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是由华夏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和各民族应一律平等的现实，不能正确地反映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全貌，从而违背了国家提出的整理古籍的根本目的。再者，在古籍与文献的内涵一节中，我们已讲到中国的古籍文献包括政治、经济、民俗、语言、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法学、农学、医学等各门各类各学科，其中的文学类，本身就含作家文学和非作家文学。非作家文学亦即民间文学或称口头文学，而口头文学即我们所称的口碑文献。

综上所述，不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或是从学术角度讲，民族古籍应当包括口碑文献。但必须指出的是民族古籍中的口碑文献也不能无限地扩大内涵和外延，正如“文献”一词本身一样，不同时期有不同含义，当我们讲“古籍文献”时，这个“文献”就是特指跟古籍相联的历史文献，不含建国前后的“革命文献”。（当我们现代或当代的书已成为古籍的时候，那“革命文献”也就自然成了那个时期的特定的历史文献了。）因此民族古籍中的口碑文献也应有它特定的内容。一般的说，主要是指那些含有民族历史折影的神话、英雄史诗或创世纪等。但五十五个民族文化发展不平衡，在确定口碑文献内涵时，不应“一刀切”，还要因族制宜。总的原则是口碑文献的外延不能无限扩大。

讲民族古籍，无非两大要素。一是“古”，指时限。二是“籍”，指内涵。民族古籍时间下限的确定不同于汉文古籍，因汉文古籍整理有悠久的历史和坚实的基础，文种单一。而民族古籍，民族多，文种繁杂，基础薄弱，历史进程有差异，文化发展不平衡。因此很难笼统划一，还应“因族制宜”。不顾各民族的历史，统一定时间下限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有文字而且古籍存留比较丰富的民族，古籍时间下限可以远一些，相反可以定得近一些。定古籍时间下限是科学性、学术性很强的，应由各族专家和有关学者，根据各民族存世的古籍具体情况共同研究，科学界定，不能“一刀切”。

民族古籍的内涵是包括古籍时间下限以前的各门各类各学科，具体地说是含文学、历史、地理、经济、语言、文字、艺术、医学、法学、哲学、农技、宗教、历法、军事、政治、碑铭、拓

片、文书、档案、方志、谱牒 、民俗以及乡规民约和口碑文献等等。就其形式而论，民族古籍可分两大类，一、有文字类，二、无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中包括：1. 各种民族文字（包括民族古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2. 汉文记载的有关民族史料；3. 用汉字作记音符号记录民族语言的各种资料民族古文字是指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少数民族创造并使用过的各种文字，如：佉卢文、焉耆　　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察哈台文、西夏文、老藏文、八思巴文、老彝文、老傣文、东巴文、契丹文、女真文和满文等。这些文字今天不再使用，它们在历史上都发挥过作用。用这些民族古文字记录下来的古籍文献，或多或少都有留存。

用汉字作记音符号记录民族语言的古籍，在南方的一些兄弟民族中都有留传,如已经整理出来的《侗族史诗　　起源之歌》和《古壮字文献选读》（以上的书，均由原中央民族学院古籍办组织整理出版）。布依族、苗族也有。随着民族古籍工作的开展和对民族古籍收集挖掘工作的深入，相信定会发现更多的资料。

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文献。

总之，民族古籍是个总体概括的称谓民族古籍的涵义是广义的，确切地说是古籍加 文献，民族古籍的时间下限的界定应“ 因族制宜 ”,不能笼统地划一。

第四节　整理民族古籍的意义、目的及民族古籍的特殊性

一、整理民族古籍的意义和目的

民族古籍是我国各少数民族先民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社会和自然做斗争的光辉写照；是他们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结晶；是各兄弟民族与汉族共同创造祖国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记录；也是各兄弟民族为祖国的形成、发展和统一做出贡献的光辉篇章；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各兄弟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思想精华，无不存留在民族古籍中。因此，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整理民族古籍是全面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的兄弟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繁荣与发展，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1.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古籍记录了各民族自己独特的形成、发展和统一的过程。历史上不论如何改朝换代，也不论出现过何种纷争，也不论哪个民族占统治地位，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始终作为一个整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告诉我们：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终究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我们各族人民的历史传统。通过整理民族古籍，展现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源远流长血肉相连的民族关系，对巩固祖国的统一，反对民

族分裂，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和受所谓正统观念的影响，过去我们各少数民族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在文化上也没有地位。翻检过去的编著，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经济史，社会思想史等等，确切地说，应该冠以“汉族”，而不应冠以“中国”。即便是其中写有少数民族也是作为“夷、蛮”等民族作“乱”或“入侵”中原形象出现的，严重地歪曲了祖国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这一历史事实。就文学史来讲，有的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史”曾说：“中国文学没有英雄史诗和长篇叙事诗”。这正是以偏概全的例证。它说明了尽管汉族的文化较之各兄弟民族进步快一些，但它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汉族文学史上没有长篇叙事诗和英雄史诗，但少数民族有。巨篇：《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等英雄史诗是国际学术界极为重视的瑰宝。苗族的《古歌》和赫哲族的《依玛甚》、彝族的《阿诗玛》及傣族等待整理的五百多部叙事长诗，无不都是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佳作。少数民族的神话，更是绚丽多彩。它涉及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的各个侧面，开天辟地，人类起源，日月星辰，原始婚制演变，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多方面的内容，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各民族祖先的思想特征和思维方式与能力。它的完整性又远非汉族残存片断与不联贯性的神话所能比拟的。而少数民族的叙事长诗和英雄史诗及神话所采用的韵文体，散文体，散韵结合，说唱结合等多种表达形式，也是汉族所没有的。此外，只靠汉文史料而在学术界长年争论不休难以解决的问题，现在从民族古籍中得到了印证，问题迎刃而解。“红学界”对曹氏世家争论不止，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